

再談中史教學

楊永漢

(信報，2018年5月11日)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被推為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司馬遷曾言：「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太史公書自序》)。司馬遷認為史學家的職責是將歷代有功德於民族國家的人物記載下來，對道德高尚、學問淵深的聖賢學者，要留下他們的心跡，成為後世的楷模。倘失去此功能，則是史學家的大罪。《史記》在漢朝，不甚流行，沒有學者加以註釋闡述。原稿在西漢後期散佚，現存最早版本，應是六朝時期的殘卷，藏於日本。

一部偉大的著作，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班固評《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原因是《史記》不合當時政府所推的道德標準，不特別宣揚儒家思想，贊美崇尚正義的遊俠，欣賞工商業致富的奇才。因為不能成為當權者的宣傳品，這就被當時政府及士大夫所忽略。

中國古代政府非常害怕私人著述歷史，私人著史，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因為私人著述會將當權的醜惡載於史冊。所以，我們看二十四史所記載的皇帝大都是天縱英明、智慧高超、道德無倫的聖人，每次看見歷代帝皇的廟號，我都有點「毛骨悚然」。

現代歷史教學，減弱了道德的元素，著重史事的正確性，再加以現代道德的評判。但無論歷史教學如何的變，也不可忘記史遷所說的史家責任。陳勝被列入世家，是平民反對暴政的首義，足法於後世；孔子列入世家，喻其萬代而不衰；呂后列入本紀，是明確了她的統治實權。一褒一貶，皆有所據。往後的正史中，誰人是循吏，誰人是酷吏，都反映當時對官員的要求。

北魏孝文帝漢化，使漢族與鮮卑融和，固然有益於民族統一，但相對於鮮卑文化，可以說是一次災劫。馮道歷五朝八姓十三君，被稱無恥，但他大規模官刻儒家經典，不過問財政軍事，又是另一個歷史評價問題。

中史教學，第一考慮是史事內容正確與否，第二歷史評價中肯度。評價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也看到普遍價值觀。同時，亦是政府推展社會道德趨向的工具。西漢流行五德終始說，王莽因勢攝居帝位。不論他的弊政如何，他曾是數十萬人擁戴的賢士，終生檢樸。假設王莽成功治國，又會是另一新局面。王莽被稱「篡漢」，並以「偽」稱其人，都與東漢崇尚節氣的社會氛圍有關，這些都歷史教學的難處。

再者，歷史編寫的一字一句，都可以具有巨大的意義與影響力，例如，是黃巢起義，抑或是黃巢之亂；是流寇之禍，並是流民之變。足以反映編寫者的取態或當權者所希望灌輸的概念。歷史教學，真的不可不慎。鄭樵曾說：「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說的就是真實地面對歷史。